



濠南别业紫藤“生辰之问”

□姜松延

每年4月中旬起,濠南别业的紫藤便成为备受瞩目的网红打卡点。那一紫、一白两挂藤花,犹如梦幻瀑布倾泻而下,空气中弥漫着馥郁的芳香,景色美不胜收。众多市民和游客纷纷慕名而来,在紫藤花下驻足拍照,留下美好的瞬间,沉醉于这烂漫春光。然而,如此知名的紫藤、国家二级古树名木,其栽种时间在历史资料中却难觅确切的记载,以致有“百年紫藤”“树龄120年”“130多年”等各种说法,莫衷一是。

上图左起:张謇与家人1919年前在濠南别业所摄的合影上,攀援而上的东侧紫藤清晰可见;花季景色。

为揭开谜团,研究者从多方面进行了探寻。有人依据张謇《庭中朱藤开几匝月姚光冶色灿烂殆不可状诗以张之》的诗句展开推算。诗中提到“修藤移来七八载,芟理颖植架抚……三年蔓交叶覆盖,高不过丈平屠苏”(一丈约3.33米;屠苏,此处是房屋的意思)。从诗句可知,紫藤移栽后生长态势良好,经过近三年长成藤蔓纠缠、绿叶繁茂的样子,但藤高不超一丈,大致和一间平房的高度相当。查阅张謇日记,1923年三月十五(公历4月30日)“有《朱藤诗》”,由此推算出两棵紫藤大约移栽于1915或1916年,即栽种时间的下限为1916年。

一幅张謇与家人在濠南别业阶梯上的合影,也为我们解开这个疑问提供了重要线索。照片中,靠一楼阶梯内侧花槽上的一棵藤木十分显眼,已经伸展至二楼之上,从照片目测,其根部树径在2厘米左右。再看照片中的人物,右边两位是张孝若、陈石云夫妇,左三坐在童车里的是张謇长孙女非武(1916年12月—2016年9月),他的次孙女柔武(1919年4月—)此时尚未出生。结合出镜人物信息与

别业建成时间等多方面因素推测,这张照片应摄于1917或1918年,图中紫藤当为移栽而来,其移栽时间,自然是在此照拍摄之前。再根据紫藤生长速度推测,移栽前它已生长数年且有一定高度。

另有张謇致孙支夏函(十件之五),信中的内容引起了笔者的注意。他首先对濠南别业种松给出了详细指导:“别业表门内种松,椭圆坛江边之泥已否填满?似可多用水藻及苑中拔出之青草(亦可夹用马粪)已淤于池内者,加入泥中,上仍盖泥尺余,四周略高,俾聚雨水渗入以腐之。”接着,他又针对紫藤棚的安置提出了具体建议:“露台上藤棚圆铁柱,似二寸半或二寸径已足用。第一层东西南三根横梁,二寸或寸半径亦可;第二层东西横梁四根,寸半或一寸亦可。柱须生铁,梁似可熟铁拳圆,酌之。”如此在行、细致的交代,充分体现了他的“专业”水平以及一贯认真负责、一丝不苟的办事风格。由于准备移栽的紫藤已有一定高度,且具攀援属性,自然就需提前搭设棚架。所以,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,张謇交代的应该是种藤、移松之前的

有关准备工作,也可据此推测种藤与种松时间基本同步或相距不远。

那张謇的这封信函写于何时呢?看落款时间为“七月十四日”,原函并没有写明年份,在收录于《张謇全集》时则有加注“民国四年(1915)后”。而张謇曾以诗《移松行》记录移松之事,《全集》将该诗的写作时间定为民国四年农历十二月,即公历1916年1—2月。以笔者猜测,《全集》编者所注“民国四年(1915)后”可能就是据此而来。然而,笔者不知《全集》中这一系时依据的是什么文献,否则,种松时间上限可定在1915年“七月十四日”以后。

另有1916年1月29日的《神州日报》载:“濠南别业精心结构,风景极佳,虽一花一木之微,亦皆布置入画”。在此之前的1915年3月,因袁世凯急于称帝,并私订“二十一条”,张謇闻之愤而决裂,请假回到南通,过上了“悠游林下,终日书史自娱”的生活,也让他有了充裕的时间关注或打理花草树木。虽然这篇报道并未直接提及紫藤,但其中的内容与前面推算的植藤年份并不矛盾。

也许是一种缘分,在濠南别业建成110年之际,就在别业双藤再次绽放花朵之时,笔者在1915年10月2日的《通海新报》中读到一首首名“濠南”的《别业落成》诗:“别开新宅近海边,馆苑楼台若比肩。种竹恰能逢醉日,移松不复计栽年。”这便将种松时间下限进一步推到了1915年10月之前。

在上述推论中,种松的大致时间看似已基本明确,但选在盛夏或初秋时节种下一棵大树,又明显有悖于常识。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与绞尽脑汁的探寻后,笔者在陈松林老师所著《张謇长诗(移松行)写于何时?》一文中找到了问题的关键——《全集》对该诗的系年存在错误。陈文史料翔实、逻辑严密,作者依据张謇1915年5月《复庄菴宽函》与1914年12月、1915年2月给张孝若的信中有关内容,经过一番严谨缜密的考证,最终得到了一个极具可信度的结论:“张謇《移松行》写作时间当在1915年3—5月。”据此推断,那张謇致孙支夏函(十件之五)的系年应为1914年。

至此,综合以上信息,再结合通常的植树时节,或可推论出濠南别业两棵紫藤的移植时间为1915年春。

江知源为遵师命做了多少工作、承担多少压力。

1927年,张謇哥哥张謇受当局通缉逃亡大连,江知源独立支撑公司。1929年,江苏农垦厅长何玉书考察垦牧,目睹了公司在江知源治理下的概况。江知源指着目力所及在水上排列的帆船不安地说,这些都是海盗船,有数十条之多,三四百名海盗打家劫舍。回到公司,见大门口两尊三英寸口径火炮,何玉书深为震撼。中午吃饭,豆腐青菜、四盘四碗全是公司自产。他何玉书说,他反对用外国工程队,(他们)自己建设的合中闸花费58100元,耳闸花费10000元。

江知源深知独力难撑,对昔日的理想心灰意冷,遂于1929年6月7日的二十三次董事会提出辞呈,避居大连去了。

江知源的离去使垦牧公司群龙无首。1935年,张謇儿子张孝若又离世,这时的股东又想起江知源,遂力邀他出席12月25日的股东会,让他筹集偿还上海银行的借款等;又在1936年2月12日的董事会上“公推”他任会议主席,并代理董事长一职,要他出钱出力。1938年12月28日,董事会表示被秋潮损坏的堤岸尚缺两千元没处筹,公决“请江董事知源设法筹措……”江董事此时已精疲力竭,终于1939年追随张謇去了,草草结束了他耿直忠义的书生一生。

江知源在去大连前已处理了在海复的地产。把张謇赠送给他的60股红利分得的1400亩地及用自己的积蓄买的600亩地一并出售,共得银数万元,交江谦赠送家乡重修萧江祠堂用去部分,余款修建了江湾中心小学,添置一应设备、制发统一校服,开安徽省创建中心小学的先河。后人在江湾“乡贤祠”内为他俩立了石像。江知源移居连山村后,把居所名为“无闷庐”,从庐名就知他心情了。庐后种植几十亩果园,叫郑孝胥“投资”他的林果业,他在无闷庐内研究易经、佛学。杨懋龄写诗说他:门无俗客,室有藏书,窗前更补松梅竹,为伴高人耐岁寒。郑孝胥说他:廿年隐海滨,读易忘其老,避乱复居江,植果守荒岛。

江知源存世的文字有不分卷的《茅山志辑要》。他把张謇写给他人及同事的数百封手书汇编成《菴翁曼道手牍》。

江知源悟道又不甘为道,他隐居又不忘奉师命出山。张謇的好友刘厚生说,人们常看到张謇坐一独轮小车前行,而江知源便在后面紧随,不畏寒暑。

江海廉韵

戴联奎墓：遗存石刻传清风

□丛越 白本

如皋东陈有一个尚书村。所谓尚书,即清代名臣戴联奎。他的墓地就在尚书村。

经过十年浩劫,墓地已毁。幸运的是,还有十座石像尚存于尚书村墓地附近,已被定为南通市文物保护单位。一对石羊、一对石狮、一对石马,位于室外,经过上百年的日晒风吹,动物石像身上都已泛起青斑。另有四尊石翁供奉于室内,为青石石质,身高在2.45至2.72米之间,每尊重两吨左右。两尊文臣,头戴龙图阁学士官帽,亦宽袍大袖,手捧牙笏侍立左右;两尊武臣,头戴参知政事官帽,身穿宽袍大袖的朝服,一尊手执剑,一尊手执钺。坊间传闻,彼时大贪和坤东窗事发,戴联奎抄家有功;戴联奎离世后,皇帝便将和坤原本为自己预备的石人石马赏赐戴家,用于筑造墓园。这个传闻是否真实,难以考证。

清道光本如皋《戴氏宗谱·卷二·墓图》录入《大司马紫垣公墓图》。紫垣公正是戴联奎。有图可见,戴联奎墓自南至北依次是牌楼、石像和墓穴。牌楼甚是雄伟,上下共三层。顶层上书“圣旨”二字,中层为正文“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兵部尚书戴府君墓道”。三个官名的排序颇为有趣。戴联奎一生出任多种官职。清代进士毛式郇(礼部、吏部侍郎)作有《二十五世紫垣公传》,戴联奎世居如皋,后来寄籍大兴:乾隆甲午,公领京兆解首。乙未成进士。戊戌授编修,改复原籍,累迁至学士、詹事、阁部,擢兵部侍郎,调礼部,复调兵部。丙寅督学安徽。庚午典江西试。癸酉奉命督学山东,未之任,丁周太夫人。忧起,复吏部,擢左都御史,晋礼部尚书。戊寅调兵部尚书……

牌楼所刻“光禄大夫”虽为死后的封官,但为正一品。一位汉人当时能获此殊荣,实在难得。“经筵讲官”是指皇帝的老师,戴联奎曾任嘉庆和道光的老。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,手握兵权。其中“经筵讲官”最是令人关注。清朝每位皇帝的老师一般只有三四位,譬如道光皇帝只有三位老师,其中两位来自如皋,除去戴联奎,另外一位是白蒲的沈岐。其次,整个清朝能够出任两位皇帝的老师的只有三人,除去戴联奎,另两位是汤芳望(顺治与康熙)和翁同龢(同治和光绪),因此戴联奎可称是“清朝中期第一帝师”。

戴联奎身后能获此殊荣,实源于其清正廉明的为官之道与淡泊自守的处世品格。《二十五世紫垣公传》等文献详载其嘉言懿行。他曾自述清廉之本:“一个人习惯于华靡(丰衣美食、富足华贵的生活),家人就会效仿,忘记初心,习惯奢侈。我不知道奢侈的快乐,也不知道淡薄的辛苦。家用节约,公款开销也能自足,确保我初心不变。”其风骨尤见于拒附权贵一事。权臣和坤邀请部二云、戴联奎师徒二人为其子(当朝驸马)讲课,邵氏称病推辞,戴联奎也坚决拒绝。和坤又用花言巧语,欲送重礼,戴联奎依然不从。毛式郇为此大赞戴联奎是“平居浑浑,不见圭角,而临事断然”。户部右侍郎徐士芬《阁部著》记录,皇帝曾经称赞戴联奎是“吕端大事颇不糊涂”。清曾既著,恩宠遂隆。《如皋戴氏宗谱》有记,嘉庆皇帝先后于丑、戊寅、己卯年三次御赐“福”字给戴联奎。如皋戴氏二十八世戴经源还立下扫墓祭祖的家规:“祖宗坟墓,祭扫千秋。秋风春雨,倾塌必修……岁时祭祀,以答神羞。牛羊行旅,毋许践踏。斯言不信,家法绳科。”戴联奎清廉谨慎的家风,得到了传承与发扬。

海安曾经有支“二轮车”运输队

□苏学勤

解放初期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,海安不少人把自行车作为谋生的工具,不仅形成了一个群体,而且建立了组织。这段被现在人几乎淡忘了的史实,说起来也蛮有意思的。

解放初期,一穷二白的海安县没有工业,河道港汊太多,交通事业并不发达,直到1958年,县里机关才有了汽车。“合作化”高潮以后,国家又开始实行“统购统销”政策,许多原来做粮油、布匹的小业主们纷纷失业。一些做小本生意的,都想找一个能维生的活计干。

由于当时海安没有工业,要想找工作很难,这些人当初的年纪也就在二三十岁,头脑蛮灵活的,他们看到海安交通的薄弱环节:各个乡镇的桥梁狭窄,汽车无法通过,众多乡村道路都是羊肠小道;从县城汽车站或轮船码头下来的旅客,只能靠步行回家,扛着包拎着东西,特别是妇女或年老体弱的,都感到十分吃力困难。

于是,有人试着用自行车帮送旅客,这支“二轮车”队伍越来越大,从初期的几个人在车站、轮船码头“喊生意”,到后来发展成几十人的队伍。虽然送客一趟只有二毛钱,但一天挣个块儿八角钱的,也能解决一家三四口人的生计。

当时,买辆旧自行车只要几十元钱,回来后加固链条、齿轮、轮胎,后面用两根竹片延伸座位长度,上面再加上个棉花布垫儿,让乘客坐得舒服一点。这样不用办任何手续就能上路挣钱。有的人买不到自行车,就找钢管焊车架,七拼八凑搞成车子上路。

那个时候的客流量是有限的,几十辆二轮车排队等生意,一天也只能摊上几个客人,有人开始把目光转向“踏货”的方向。那时,海安及东的蛤子(文蛤)等海鲜蛮多的,但由于交通不便,鲜货运不出去,有时即便运到周边城市,由于中转时间长,蛤子变了质,变得一钱不值。这些踏二轮车的知道,打通这条通道,要有两个条件,一是踏车的人要有体力,能踏长途,来回100多公里,途中不能歇腿;二是自行车不能出故障,坏在前不把村、后不把店的地方,烈日一暴晒,文蛤一张嘴,鲜货就变成了“臭货”。

于是,有几个头脑活络又略会修自行车的人,结伴先行“探路”。他们备齐了补贴胶水及气筒等应急东西,第一天先到老坝港去买蛤子,装进用细麻绳扎成的透气网兜,挂在自行车两边,晚上回到海安,这一趟来回就有100多公里。第二天半夜时刻,又动身前往离海安60多公里的泰州市,转手卖出。当时的这种海产品,买价只有几分钱一斤,卖出时每斤角把钱,一趟也能赚个十来块钱。但这个活儿挺累人的,两天一夜要骑三四百里路,人到家都累瘫了。许多人为了生活,就这样踏海货干了好几年。

1958年,这些踏二轮车的人,终于进了组织,归属海安镇客运站管理。当时这支队伍有100多人,县城百姓习惯称客运站为“二轮车站”。六十年代初期,客运站曾划归海安搬运公司管理,但这支队伍中基本无人想当搬运工人。他们知道,干装卸工要比踏二轮车苦得多,这个活干不下来。此时,这支队伍成了弥补城乡交通工具不足的力量,车站、轮船码头随处可见二轮车的身影。

到了八十年代,海安还没有达到“乡乡通”公路的要求,县城里也没出租车。旅客们走出车站码头时,招手就能唤来二轮车,他们充分利用地熟的优势,几毛钱就能送旅客到县城任何一个社区,块把钱就能到10多里外的乡村,挺方便的。即便是夜晚,车站及县城几个繁荣地段也能看到二轮车的身影,百姓们也认可这种交通工具,图个方便。

直到九十年代初期,海安交通事业才得到大发展,中巴车开到了各个乡镇,“野鸡”出租车在城里也能见到,摩托车在农村大量出现,通讯工具也有了“大哥大”,二轮车逐渐没了市场,加之不少踏二轮车的人陆续退休,经营了多年的二轮车运输终于在县城里逐渐消失。